

# 巴黎和会 中国拒绝签字背后的细节

对北洋政府(1912~1928)来说,1919年春的巴黎和会是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一战结束,由于中国加入了英法美等组成的协约国,属于胜利的一方,中方希望能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青岛等地。而同样是战胜国的日本,则希望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最终结果,日本成功了,中国成为受辱的战胜国。巴黎和会的结果,导致中国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而中国代表最终也没在和约上签字。

## 人事斗争:和会首先是内部会议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1919年1月11日,他抵达巴黎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主要的协约国,比如英法美,都是五个席位,五名代表可以上会,陆征祥也是按五个席位准备,结果到巴黎才得知,中国只有两个席位。作为团长,他必须占据一个名额,剩下就只有一个席位了。

1月18日下午,在和会正式开幕前36小时,陆征祥终于打听清楚,尽管中国有发言权的代表只有两名,但每次参会的人员可以不必固定——这样他还是可以组建一个五人的代表团。陆征祥征求意见后定下方案:由王正廷(南方政府代表)任第二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为第三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为第四代表,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列第五位。但是北京方面推翻了这种安排,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关键的调整是顾维钧取代王正廷排第二位,北京方面的考

虑是,如果出现陆征祥因病不能参会的情况,万万不能由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掌管大局。

因为名次的变化,不但王正廷大为反感,施肇基也很不悦,他自认资格够老,如今却排在了第四位。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很不幸,以王正廷、施肇基为一方,与陆征祥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纠纷,这种攻击甚至会连累他人,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岳昭参与了起草向北京的申报名单,他们认为岳是陆征祥的“私人秘书”,要求换一位秘书长。有时,顾维钧也成为批评目标。

代表们之间的摩擦日趋严重,不得不更换了新的秘书长。2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第一个赶到会场的顾维钧惊奇地发现,通常属于会议主席陆征祥的位置,却放了两把椅子。王正廷的秘书说,既然王代表的是南方政府,地位和陆征祥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该像联合主席一样并排就座。陆征祥对这样的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左侧的那个椅子上平静地坐下了,这时王正廷进场,直接坐到了右侧的椅子上,并毫无顾忌地宣布开会。会议进行中,王正廷不断用肘部向陆征祥那侧挤去,陆征祥不得不一点点挪开,最后索性离开了桌子,坐到一边去了。

第二天,陆征祥称病未能到会,不久,他就离开巴黎,去向不明。代表团随即陷入混乱。顾维钧建议,马上派人去寻找陆征祥,其它工作按照原计划完成。最终,大家获悉,陆征祥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栋房子,那是他最喜欢的休憩之所。陆征祥离开后,

大家议论纷纷,有消息称,梁启超将取代陆征祥出任代表团团长,但是到3月份,陆征祥又回来了。

## 文件丢失:日本谍战疑云

按照和会要求,中国代表团要准备一份书面声明,因为顾维钧的陈述曾指出,中国和日本当初所签订的“二十一条”是不平等条约,不应算数。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对此要求,中国最好在书面声明后面附上中日之间所签署的协定。顾维钧草拟了一张单子,列有中日所签的各种协定,但北京来的顾问们看后,认为并不完整。王正廷和施肇基主张附上全部协定。顾维钧表示同意,但他提出,自己在华盛顿收集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任何于1918年秋所签的协定。外交总长随身带来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些协定。于是,代表团一致决定,立即致电北京,索要中日缔结的各种协定的文本。

从外交部带来的资料,大部分存放在一个公文递送箱内,但是这个箱子不幸遗失了。顾维钧从华盛顿带来的资料中,有关国联问题的资料相当完备,但是有关山东问题的资料却短缺很多。许多与日本签订的协定,特别是各种借款协定,政府当时驻外使节团都没有告知。递送箱的遗失非常蹊跷,这是一个装有有关满、鲁、蒙等问题绝密文件的文件箱。公文递送箱是随同外交总长陆征祥一起横渡太平洋的,顾维钧一直认为,它是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偷走的,因为大木箱内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感兴趣,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废纸而已。

递送箱一直没能找到。代表团不得不和北京联系,以迅速取得中日缔结的协定内容。出于种种原因,北京曾几次复电说文件已经给齐了,但代表团发现仍有遗漏,于是再次去电索要。直到最后,代表团发现文件还是不全,遗漏的协定有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王正廷和施肇基认为,这是北洋政府在故意捣鬼,不想让他们知道内容。如今看来,更大的可能是效率问题,

以当时北洋政府的办事能力,即使是凑齐一套文件都并非易事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备的公务员制度,一切都显得不那么正规。

## 拒绝签字的背后:姑娘与手枪

中国在和会上一无所获。根据协定,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某些代表团,特别是法国政府人士方面,普遍产生一种印象,即北洋政府已经训令签字,只不过某些中国代表依然在坚持要使中国在和会上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已。

6月27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顾维钧去医院向陆征祥报告情况。和会对中国的不利决定,已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是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的主要原因。

晚饭后,顾维钧去看陆征祥,发现岳昭也在,他们谈了几个小时,岳告辞,几分钟后,他又折返回来,脸色苍白。他告诉陆征祥,自己在医院的花园里受到了袭击。据他说,医院花园里聚集了数百名中国男女,他们拦住了他,质问他为何支持签约。他们把他看作是陆征祥的心腹,并且认为陆征祥已经不顾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协定上签字。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人群中有一个女生,甚至当真在她的大衣口袋内用手枪对准了他,于是他只好跑了回来。

顾维钧只得出面,因为在媒体的报道中,他是主张拒签的,他的出面让局面消停下来。

6月27日下午,代表团致电请示北京,要求同意拒签,而北洋政府回复说,早前已经发过一个电报,就是同意拒签——但这个回复是在28日下午3点以后到达的,这时巴黎和会已经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拒绝签字了。

巴黎和会没有采纳中国代表团的意见,这算是外交上的受挫,但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却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拒绝签字就意味着,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条款,对中国来说是无效的。据《看历史》黄小凡/文

## 陈嘉庚抛却私谊声讨汪精卫

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与汪精卫早就相识,私谊不错。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以后,曾拟聘汪精卫担任校长,后未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竟然主张对日妥协,破坏抗日大局,这是所有爱国军民所不能容忍的。陈嘉庚不顾旧交私谊,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名义打了一封电报给汪精卫,指出“和平绝不可能”。汪精卫复电称:“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往返数电,陈嘉庚发现汪精卫不仅毫无悔意,而且朝着卖国求荣的道路越走越快。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为期十天。利用开会之机,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个字的提案,会上一致通过。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在主持提案审查会议时读了一遍,当念到“汉奸”几个字时,“面色突变苍白”,神色十分不安。这是陈嘉庚在“南侨总会”成立之

后,对国民党妥协派打响的第一枪,震动了朝野。

1938年11月30日,日汪双方在上海召开“重光堂会议”,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秘密协定》等文件,日汪勾结正式形成。12月18日,汪精卫带老婆陈璧君逃离重庆潜往越南河内。

汪精卫集团出卖中国主权的可耻行径,激起广大爱国军民一致愤怒和反对,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看到蒋介石只是“永远开除汪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而并未按国法治罪,陈嘉庚又致电追究到底:“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接着,“南侨总会”发出第20号《通告》:“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

为了捍卫民族和国家权益,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揭露,敢斗争,表现出一个爱国侨领的崇高觉悟和气节。

据《文史月刊》曙朝/文

